

2018.2.9

前言 探寻邓小平

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邓只靠记忆就能做一个小时及以上的条理分明的讲话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

1969年至1973年邓小平下放江西的三年半里，他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

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1956年以后与其他5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

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负责落实，而不是理论。

毛泽东批判过邓小平两次，但从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他只是让邓小平靠边站，以便今后可能时再起用他。

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3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乐。

蒋介石要与诸如大商人、地主和军阀这样的权势集团合作，而那些人已经失去了普通百姓的支持。在并不稳固的军阀同盟的支持下，他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可是他无力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从而失去民心，在后来的内战中输给了更加团结的共产党。

2018.2.10

第一章

1978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变得咄咄逼人，因此西方各国乐于帮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

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7个月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

共产国际希望和潜在的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比一般俄国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邓小平1949年至1952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1980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邓小平

他（1931年）被指为“毛派头子”受到惩罚其实是他的运气，因为这使毛泽东长期相信邓小平是忠实于自己的。在后来的岁月里，即便在毛泽东让激进派批邓时，也绝不同意把邓小平开除出党。

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的邓小平，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

延安既是个足够大的根据地，又离敌人相当远，这使毛泽东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

内战期间，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年轻人中寻找和培养有前途的共产党组织人才，其中有两个人，赵紫阳和万里，在1978年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期间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毛泽东给地方的中共司令员自行决策留出的空间要远大于蒋介石给其将领的空间。

（常凯申微操）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1984年问邓小平，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他们克服兵力装备都不如对手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他特别提到了横渡长江的壮

举。

解放城市后，一部分军队需要留在城市建立军管会，以便管理城市和开始政权过渡工作。

在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期间，邓小平承担起公共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治安、经济、工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

华南局的叶剑英曾受到批评，说他对当地的地主手太软；与叶剑英不同，邓小平在土改中成绩斐然，他斗地主，处决了一些大地主，把田地分给农民，动员地方农民支持新的领导，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1953年（一五计划开局之年），财政部长薄一波丢掉了职务，毛任命邓小平接替了他。

1953年底，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了中共统治早期面临的最严重人事问题：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警告，邓小平和陈云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巴黎和上海时就与周恩来相识的邓小平，也能够观察这位大师如何处理外交事务，如何全面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他那一代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此外，作为建立新组织的参与者，邓小平也有机会了解做出重大决定的理由，思考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大框架，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1980年代重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很有帮助。

1960年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

他在1954年担任的秘书长一职有党内管家的性质，这使他能够深入参与所有重大决策过程。

“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默不语。

据外国分析家估计，“大跃进”期间和此后数年间，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万。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事在一次政变中赶下台之后，毛泽东就对那些没有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放心，更多地谈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也愈加坚定地要求对他个人的完全效忠。

毛在1966年5月中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亲自带头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没有完全服从他领导的人。

1967年，邓小平夫妻被软禁在中南海，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还能够用节余的工资购买生活必需品。毛泽东既要给邓小平一点教训，也为日后重新起用他留了余地。

1969年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级干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苏联一旦入侵时他们可以在当地组织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东，叶剑英去了湖南，聂荣臻和陈毅去了河南；陈云、王震和邓小平分别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实上，他们下放农村后，并没有在组织地方做好抵抗准备中发挥任何作用。一些敏锐的北京观察家认为，是林彪害怕潜在的对手，而以苏联进攻的危险为借口说服了毛泽东，把有可能威胁到其权力的北京高干流放到外地。确实，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后，这些领导人纷纷获准从地方返回北京。

去江西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第二章

毛泽东曾经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锁隔绝的时间思考中共夺取政权后全国的整体战略，邓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时光，思考着他所要进行的改革的大方向。

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在1969年曾让4位老师——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和叶剑英——就如何对付苏联的危险出主意，他们回答说，中国应当主动与西方修好。

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

毛泽东一给他活动空间，周恩来便运用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对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达了特别的关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属都万分感激周恩来救了他们的命，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周也对邓小平及其家属给予了相同的关照。1972年12月，周恩来觉得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便敦促汪东兴加快给邓小平安排工作的进程。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使出浑身解数，痛苦地执行着毛的指示，同时也尽力保护他觉得自己能够保护的人。他是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大师。

尼克松正在设法解决越战问题并寻找对抗苏联的长期合作对象，便指派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与中国修好。

邓小平曾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猛批，毛泽东要向人们解释为何请他回来，这并非易事。毛采取的策略是，他说邓小平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总书记“受到了林彪的迫害”。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在毛看来，周恩来差不多已经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者。

周恩来为动手术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后，邓小平开始主持接待外宾。

毛泽东撤掉彭德怀后，在1959年依靠林彪团结部队；同样，林彪死后，他也需要有人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他比林彪大10岁，没有权力野心。但是在1973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手腕更强硬的邓小平去处理美中关系时，他也转而利用邓小平帮助他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被问及毛死后会发生的情况）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对调。

基辛格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邓小平与他们不同，他更重视国内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能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哪些好处。

第三章

军队因为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和承担管理全国地方工作单位的无限责任而超负荷运行，荒废了训练，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潜在的敌人。

“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的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个领导班子，交给他们实权。”——邓小平

邓认为对于整顿军队最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复纪律，裁减兵员，改善训练，为每个单位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承担起地方的许多职能后，变得臃肿不堪，很多干部变得“肿、散、骄、奢、惰”。

很多部队单位成了一个一个小独立王国，就像抗战时期各占山头的游击队一样

2018.2.11

邓小平深知，美国是唯一能够全面抑制苏联的大国，因此每一次会见美国官员时他都会敦促他们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军队的臃肿造成预算紧张（1975年现役军人达六百万）

裁军是一支现代、稳定的军队能够长期发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

空军和海军不会减少员额，但是陆军要裁员。技术专业的岗位也不会减少。有些地方的军队人数要大幅减少，但是像新疆一类敏感地区，军队编制还要增加。

“国家财力有限，能让钱用于现代武器系统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开支。”——邓小平

从事核武器开发的二机部和研究弹道导弹的七机部闹派性十分严重。

徐州，这里是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线和南北铁路大动脉津浦线的交会点。

作为他早先采取的步骤之一，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上任之前便推荐了素以攻克难题闻名的万里担任铁道部长。

万里早年负责领导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建设项目。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语录

一旦发生战争，交通运输的地位十分重要。

邓小平在7月4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邓小平成为第一位对西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官员。（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第四章 向前看

“宗派主义”（即拉帮结伙的“左派”）

“修正主义”（即“右派”）

2018.2.13

在准备重要讲话和文件时，邓小平与政研室的人员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导，说明他们撰写的草稿中应当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们的专长来确保讲话稿和文件符合历史记录，与毛主席过去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一致。

1975年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

毛泽东说，中国在和平时期应当减少军费和国防开支，把资源用于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学习各国的长处

“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

邓小平在审阅文件时担心毛泽东的反应，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总的观点。

尽管这个领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邓小平仍大胆提出，哲学和社会科学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社会科学院。

“文革”期间，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其他任何剧目。

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很多人被调往长沙加入长沙工学院，以提高该校水平。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

坚定拥护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张爱萍）

2018.2.15

第五章 靠边站

康生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

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一百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

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从9月11日到17日，人民大会堂每天都在举行悼念活动。

2018.2.16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了太多同僚。在军队中，除总政治部外，江青得不到任何支持。

“四人帮”余党制造动乱的最大危险来自于上海的武装民兵。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你办事，我放心。”此举有助于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的态度。

第六章 复出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

过去白手起家创建国家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

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

在发生着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华国锋力求掌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加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

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念和汪东兴之前。

他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第七章 三个转折点，1978

1978年中国所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是当年春天组织的4个考察团，他们分别去了香港、东欧、日本和西欧。（对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的考察团对西欧的访问）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

由于华主席控制着北京的宣传机器，邓小平为了避免引起直接冲突，在北京时说话比较谨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话，言论上也较少保留。

叶帅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7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4个问题。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做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的。

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就像遵义会议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一样，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任仲夷

（叶帅等人）于是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

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政治技巧。到1979年夏天，邓小平要收紧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统治架构时，便开始逐步削弱华国锋并终于让他靠边站了。

第八章 为自由设限

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

（西单）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第九章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们充满自信，能够与外国领导人平等地打交道。

像过去毛和周的情况一样，通常会有一名外交官先行会见外宾，由他把来访者的意图告知邓小平，邓小平再接见他们。

“邓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并简单说明问题的实质，果断并且直截了当地做出判断和决定。”——黄华

69年7月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宣布，美国不会涉足亚洲大陆的战争。

邓小平认为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

越南允许苏联使用美国在岬港和金兰湾建造并留下来的现代化军港，这将使苏联军舰能够自由出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越南还建设导弹基地，装备了瞄准中国的苏制导弹。苏联则向基地运送人员和电子设备，为其提供技术支援。苏联沿中国北部边境驻有重兵，还预谋入侵阿富汗，而中国西部的印度也在跟苏联合作，这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

1954年越南跟法国人打仗时缺少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中国派去的韦国清将军在指挥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务也是由中国高射炮部队执行的。

邓小平在1965年曾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如果越南人结束和苏联的关系，中方可以大幅增加援助，但是遭到了越南的拒绝。当美国加大对北越的轰炸力度时，越南人为了自卫，更多地转向苏联这个拥有高科技和现代武器的国家；在中苏争执中，苏联也利用这种实力向越南施压，使其向自己靠拢。

停止援越不是因为中国难以同苏联的援助数量一争高下，而是因为越南人要在东南亚谋求霸权。

1978年5月，中国中止了21个援越项目以示报复。（当时中国已不相信能用更多的援助让越南疏远苏联。）

金日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1945年回到朝鲜，之前曾在中国总共住了将近20年。

朝鲜和越南一样，巧妙地利用中苏之争获取双方的援助，虽然总体而言它更偏向于中国。

邓小平根据自己与苏联打交道的长期经验，认为谈判是没用的。

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比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还多。它的军队人数已达450万。

第十章

日本是一个贸易国家，当时它在境外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尽量避免与任何国家全面对抗。

第十二章 重组领导班子

1978年12月，邓小平已步入权力结构的顶端，但这个权力结构并不是由他创立的。

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曾解决过铁路运输的难题，如今正在为清除农村改革的障碍铺路。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党的建设——为关键岗位选出高层干部；选拔和培养新党员。

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3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

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党制定大政方针、主管自上而下各级部门的人事和宣传，政府负责各级行政管理。高级干部都兼任党政职务，工作往往重叠。

三中全会之后还不到一年，在1980年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已巩固了权力，并能够为1980年代制定议程，为协调上层工作调整党的结构，任命他的高层团队。用美国人的说法，邓小平的班底是从1980年初开始主政的。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4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邓小平的3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接手要职。

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

各单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让单位上司及时了解哪一条指示最重要，邓小平、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这使本单位的领导核心对于如何做不会惹麻烦，如何向中央争取资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从1978年12月到1981年6月，邓（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体现了邓的战略考虑。

在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了一种微妙平衡，既对毛泽东给予充分赞扬，以免削弱党的权威，又批判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

第十三章

邓小平要浏览所有材料，以便自己决定哪些需要仔细阅读。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

赵紫阳主持国务院的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这类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但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

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政治局例会和国务院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

政治局成员以及这些书记处书记下面都有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某些系统的工作。比如彭真领导着管政法的领导小组，万里领导着管农业的小组，宋任穷的小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组管工业和运输项目，杨得志的管军事，胡乔木的管党史和意识形态，姚依林的管经济计划，王任重的管宣传，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贸和投资，彭冲的管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周边）的工作。

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共的尊严。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做出坚决的反击。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准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的准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邓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

邓大力精简吞噬着推动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党政军臃肿的官僚队伍。邓小平为缩减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因为这一政策受到不愿退休者的强烈抵制。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于使他的计划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此外，在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邓小平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做出解释，讲明大局和行动的长期目标，而不是直接命令。

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

在重大问题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第十四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

30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

邓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从1966年到1975年，遵照毛泽东要避免安全受到边境附近国家（苏联）威胁的政策，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被用于“三线建设”，货物和人员都去了基础设施很差的边远地区。

上海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习仲勋和杨尚昆设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导致广东经济起飞的措施，但是从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经济起飞的却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他的搭档梁灵光省长以前是轻工业部长，被派到广东帮助其发展轻工业。

“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盛田昭夫

1984年10月，邓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他在这一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事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事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

“文革”期间，大寨是毛泽东为全国树立的走向社会主义农业高级阶段的伟大样板。

第十五章 经济调整 and 农村改革

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在1980年初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建立了他的领导班子，由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国家，万里担任了副总理、农委主任和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

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8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7人，而且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1982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8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主义？

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干部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7名以上的员工。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第十六章 1982—1989

邓小平在1982年9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

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批准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

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支持这一文件时指出，准备文件和斟酌用词上的大量艰苦工作都是别人做的，但他同意文件的全部内容。

就像早期苏联的情况一样，社会计划体制使中国得以在1950年代推动重工业的发展。

与各种少数民族超过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人口中93%为汉人的中国也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

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

[返回](#)

53min 第17章 台湾、香...

996/1381

问答7

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去见马克思”前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存一线希望。他和蒋经国有私交，两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知道李不久前曾见过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蒋经国，就问他蒋经国对接班人问题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说

他没法说谁最终会接蒋经国的班。邓小平则说他担心蒋经国去世后台湾会发生混乱，因为那里有部分势力想跟美国和日本合作，寻求台湾独立。邓小平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有着多年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会面的邀请。^①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做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邓小平

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做好收回澳门的准备。

北京对香港的战略是“长远打算，充分利用”

这些组织在写给北京的报告中一味吹嘘中共在香港得到的支持，这使邓小平等领导人低估了香港华人居民事实上对英人统治的满意程度。其实，大多数港人都害怕刚搞过“文革”的中国会对香港干出什么名堂。

在配备好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首的新团队后，邓小平有理由相信，他的领导班子能够具备管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能力。

里根1981年当上总统后，邓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很快取得进展。此时把工作重点转向香港，可以使那些对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上表现软弱感到不满的爱国青年转而关注收回香港主权的斗争，而邓小平在这件事上稳操胜券。

邓小平对希思解释说：“我们的新宪法（八二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

驻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邓小平常用吐痰来强调重点；在场的人看到，邓小平和撒切尔会谈时，不时往痰盂里吐痰。

为了给谈判做准备，同时与香港各界的重要人物建立联络，并培养将于14年后接管香港的官员，邓小平认为北京必须向香港派出一名级别更高的党的干部。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应该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使他能够与香港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士公开对话，并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层汇报。

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切期盼大陆来解放香港。许家屯却大胆说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不信任情绪，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

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邓首先说，“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

“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迅速恶化。

1956年，四川藏区开始实行包括集体化改革在内的“民主改革”，包括没收一些寺院。其后发生了骚乱，并在1958年蔓延至西藏当地，直到1959年才结束，当时一些最好战的藏人翻山越岭逃往印度北部，定居于达兰萨拉。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在1977年，邓小平表面上仍要服从尚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但**实际掌管军队的是他和叶帅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华国锋当过公安部长，但是除了抗战时参加过游击队、林彪事件后担任过广州军区政委外，并未实际在军队工作过，缺少领导军队的经验。以军事经验、知识、在军队高层中的威望而论，他都无法与邓小平或叶帅相比。因此，**1981年6月当华国锋正式靠边站**，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时，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了自1977年以来邓和叶已在领导着军队的事实而已。军事政策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1975年中国的军队人数是610万人，1979年降为520万，1982年又下降到420万，到1988年时只剩下了320万。

邓小平仍然很担心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他从靠近中苏北部边境的伊犁撤走了大约30万中国平民，并命令情报人员密切监视苏军在边境地区的一举一动。

中越边境长达1300公里，大约一半位于云南境内，由昆明军区管辖。另一半在广西，由广州军区管辖。

中国军队向越南边境的调动都是在夜间进行，以便做到出其不意。

美国方面估计参战军队至少45万，其中包括在中国境内提供后勤支援的人，

邓分别于1978年11月和1979年1月向李光耀和卡特通报了进攻越南的计划。1979年2月初访美回国途中他在日本停留，把进攻越南的打算告诉了日本人，劝说日本不要向越南提供财政或其他援助。

中国军队选在越南进入旱季、中苏北部边境乌苏里江上的冰开始融化之后进攻越南，此时苏联军队无法从北部利用冰面越境进攻中国。

越南人口只有中国的大约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后10年为保卫其边境耗费了大量资源。

在此期间，中国不断通过边境骚扰来训练自己的军队，至少有14支师级部队被选派轮流驻守于中越边境附近老山的中国一侧。

1979年8月29日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苏联之前，邓小平指示说，代表团要向苏联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两个条件：一是苏联要从蒙古撤出军队，二是不帮助越南占领柬埔寨。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中承认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表示愿意与其改善关系。邓小平对这种语气的变化很快做出了反应，他指示钱其琛外长对这一讲话做出积极的回应。

当装载着监视苏联核武器动向的美国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时，中方让飞机停靠在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旁边，有意使苏联明白那是什么设备；当这些设备运往靠近苏联边境的新疆时，中方故意不加隐瞒，意在让苏联不敢对中国贸然发起可能把美国牵扯进来的攻击。

1980年代，中国购买外国武器的花费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台湾地区的一半。

导弹、卫星和潜艇的研发在“文革”期间普遍受到保护。

邓在1979年7月对海军干部的讲话中，仍对发展海军的计划做了限制，他说，海军的作用是防御性的，旨在保护中国近海，中国没有任何称霸的野心。

1980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982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潜基弹道导弹。

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后从11个减为7个。

邓小平很想学习日本“二战”后如何迅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但是他也从日本的经验学到了利用“溢入”效应。1978年6月28日至29日，他建议中国学习日本在“二战”后对造船技术的利用：日本通过生产过程的转型在民用船舶制造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使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够为海军建造现代军舰。

1982年一个新的机构“国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为规划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全面协调。

2018.3.10

第十九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

[返回](#)

49min 第19章 政治的潮...

1128/1379

问答1

强调，老干部要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严的职责。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注

1982年2月中顾委正式成立，邓小平希望其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正式职务。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中顾委的全部172位成员保留全薪、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10年到15年。他解释说，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它的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经验。

但是邓小平也确立了在这些老革命辞世后将取消中顾委的原则。以后所有的职务也都会有任期限制。中顾委按原定计划于1992年解散，它给了老干部荣誉地位，减少了他们的权力。

针对胡耀邦给予地方干部灵活性做法的斗争因陈云在1983年3月17日批评胡耀邦而达到顶峰。

在慎重的计划工作者看来，胡耀邦是个不守纪律的鼓动家，他不充分考虑行动的后果，也不严肃看待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计划。

胡耀邦过于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陈云等人的支持。

1986年10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在12月8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正统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一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

继续领导党的日常工作的“五人小组”——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和胡启立——都亲近邓小平，愿意听从他的领导。

1987年1月19日中央印发三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做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邓小平很清楚，毛泽东至死不放弃权力造成了极大危害。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对高层领导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

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差额选举。

第二十章 北京：1989

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4月15日胡耀邦骤然离世后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还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他们尊敬的领导人表达敬意。最初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上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采取清场行动，恢复了秩序。

当时邓小平没有插手中共每天做出的反应。但是他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

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政治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

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1949年以前参加的学生运动，有着良好的组织、经过周密思考的计划和纲领，但是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

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

群众能够长久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们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1987年却被免职，因为他对1986年的学生示威太软弱。

在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能影响学生前程的权力。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情绪。

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以为是软弱”。

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6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这些都说明了问题

的严重性。

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区的领导人坚定立场，并指示高校的党政领导把事态平息下去。

胡启立受命负责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

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1988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周恩来与妻子邓颖超的众多养子之一）。

戈尔巴乔夫从5月15日至18日对北京的访问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胜利。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达30年的疏远即将结束，关系正常化露出了曙光。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

5月16日是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点做了清场的最后一次努力。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取消原定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机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仪式。

中国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因此1987年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由邓小平同志掌舵”。

原定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戈尔巴乔夫记者招待会，由于车队无法通过广场，最后一刻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戈尔巴乔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在此之前，邓小平希望学生能够听从向他们发出的爱国呼吁，在戈尔巴乔夫抵京前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当学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访问期间顽固地占据天安门广场时，邓小平认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

邓小平说，解决全国的问题，必须先从北京开始，因为首都的任何骚乱都会影响全国。他们必须立场坚定。例如匈牙利的国家领导人做出的让步只会导致更多的要求。

赵紫阳在常委会上宣布，他不能执行戒严决定，拒绝主持宣布戒严的会议，在杨尚昆的劝说下，为避免向公众暴露领导层内部已经公开分裂，收回了辞职信。

正式处理赵紫阳的程序是在6月4日以后才开始的。

5月17日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后，就迅速开始实施戒严的计划。第二天上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杨尚昆宣布了实行戒严的决定。19日上午9时半李鹏宣布戒严将从10点开始。杨尚昆指示军队的司令员说，士兵即使受到挑衅也不要开枪。大多数士兵甚至没有携带武器。

很多北京人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5万名军人，6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小路概莫能外。

李鹏在5月22日的日记中承认，军队在50个小时里无法移动。

据李鹏的记录，到5月21日时已有21位省级领导表示支持戒严。邓小平则一直忙于和其他元老（李先念、乔石、彭真等老干部）协商，以确保上层思想统一。

其实5月20日实行戒严之前，邓小平就在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准备在恢复秩序后立刻向社会公布。

为了陆续赢得群众的拥护，邓小平需要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新领导人，并在军队占领天安门后向社会公布。5月19日实行戒严的前一天，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就已选定江泽民做总书记；他们打算在四中全会后立刻宣布对他的任命。

邓小平表扬了江泽民的果断行动：他以巧妙的方式处理1986年学生示威和关闭了《世界经济导报》，而没有引起强烈反应。

江作为较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工作了3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务。此外，他立场坚定，致力于改革，了解科技，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这些都是邓小平认为领导国家所需的很重要的品质。

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是一位能干的改革派领导人，将让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分管宣传，宋平既有经验，人缘也好，善于处理困难的组织问题，根据陈云的建议将进入政治局。李鹏已经证明能够坚定贯彻邓小平的意愿，将继续担任总理，姚依林仍担任副总理。

1980年后江在谷牧手下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获得了改革开放方面的经验。

中共最高领导层在选拔接班人时偏爱出身中共革命者的家庭、特别是烈士家庭的人，因为他们在紧要关头能够靠得住，绝对忠实于党。邓小平需要完全投身于改革、了解改革的人，而江泽民正是这样的人。他所需要的人也必须能够果断娴熟地处理危机，江泽民在处理1986年学生示威和关闭《世界经济导报》时表现出了这种素质。邓小平所寻找的人还必须能与各种人搞好关系，而江泽民在上海和北京时，证明了他能够同其他干部和睦相处。在开朗的外表背后，江泽民其实是个聪明成熟的政治人才。虽然他没有在北京的权力结构内部工作过，但他利用在政治局的3年熟悉了党的领导人和中央事务，使他成为能够有效处理政治问题的公认的人才。

据铁路官员估计，在这段时间有大约40万学生乘火车到达或离开北京，但到5月30日离京的人要多于到达的人。

学生本身就不团结，学生们无法就行动达成一致。

6月3日凌晨2点50分，迟浩田得到“用一切的手段”恢复秩序的命令。

中央领导层担心国家权威的普遍弱化，他们断定为了恢复政府的权威，必须采取强硬行动。

邓小平在1989年就坚信，苏联和东欧领导人没有为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力做出足够的努力。

来自七大军区中的五个军区部队已经在京郊集结待命。

邓命令军队只把违法者和试图颠覆国家的人作为目标。他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据陈希同说，人们“围困并殴打解放军。……还有暴徒抢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遭冲击”。抵抗的规模和决心让李鹏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乱”的说法。

当路障迫使领头的卡车停下来时，人们便一拥而上，割破轮胎或是放气，使卡车无法继续前进。然后人们又割断线路或拆卸零件，并且开始谩骂车上的战士，朝他们扔砖头石块，有些人还从卡车后面攻击他们。

在部队开始进入广场之前，广场上仍有大约10万名示威者。6月4日星期日凌晨1点军人开始从不同方向到达广场。凌晨两点时广场上只剩下了几千人。

早上5点20分时大约只剩下200名示威者。他们被部队用武力赶走，到黎明之前的5点40分，正如命令所要求的一样，广场上没有剩下一个示威者。

中国官方在6月4日过去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解放军和警察在清场之后，花了几天时间清扫示威期间遍地垃圾的场所并拆毁了“民主女神”像。

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六四”之后邓小平相信，为了重新赢得群众的拥护，党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经济发展。

西方高官停止了访华，并对出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加以限制。外贸和旅游业都蒙受损失。

邓小平说，麻烦在于一些坏人混在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成为西方的附庸。

在北京听过邓小平讲话的外国人说，他的语气沉着自信，对自己采取的行动没有丝毫悔意，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没有惊慌。邓小平似乎相信，6月4日制止“动乱”已经让反对势力安静下来，使党和解放军能够建立牢固的控制；他宣称，制止“动乱”为中国赢得了10年到20年的稳定。

邓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变化很快，严厉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续几年。他认为外国商人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改善对华关系，以便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外国政府也会重新认识到需要中国的合作。

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一些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弥合双方的鸿沟？邓小平采取的战略：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

虽然江泽民在6月4日之前就来到了北京，但邓小平要确保江泽民的名誉不因亲自参与在北京恢复秩序的工作而受到影响。

曾庆红很好地运用了他的个人关系网，协助江泽民在北京政坛上周旋。

邓小平过去多次说过，自己最后的责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干部能够自动把权力交给更年轻的领导人。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毛泽东在“大跃进”带来困难后曾一度隐退，有关他生病或死亡的谣言满天飞，为此报纸上有意刊登了毛泽东游长江的照片。

邓小平也对李政道说，“我的第一愿望是完全退下来，但是如果出了乱子，我还是要管的。”

1989年11月以后，邓小平不再主导政治舞台，他不再参与问题的确定、大政方针的制定，做出最后决定或控制媒体内容。不过，他确实继续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影响——如果需要，他还会使用这种力量。

里根总统打算跟台湾建立正常关系时，邓小平和布什副总统努力不让中美关系出轨。

事实上，1989年以后，中国转而向苏联购买苏-27战机，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设备和物资。中国不再愿意从美国购买任何重要的军事设备。

天安门事件一个多月后，在7月14日法国召开的七国峰会上，主要问题不是是否制裁中国，而是应当采取多么严厉的制裁。布什总统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张较温和的制裁。

就像1957年时的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肯定了民主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但能取得多大的进展，取决于国家的政局稳定。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

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1988年9月26日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经济紧缩计划是当时政策的得意之作。1988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

此时在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

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做出严肃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谨慎的计划官员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失控要对1989年的悲剧负责，因此他们更坚定地要把国家控制在他们认为唯一安全的轨道上。邓小平则认为，不加快国家的发展，共产党的统治就会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样坚定地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和开放才能维持民众的拥护，使国家得以生存下去。

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邓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间，已经在争取能使他压倒稳健派经济政策的政治力量。他在上海与当地负责人讨论了开发浦东的大项目。他知道上海的负责人急于开发浦东，但这必须得到北京的许可。

1980年代中央为广东和福建率先进行试验开了绿灯，却没有让上海这样做，这使他们十分不快。上海的负责人并不讳言：上海有着比广东和福建的任何城市更高的教育、科技和工业水平。

上海的领导人得到了群众的全力支持，是邓小平加快发展经济的强大同盟。

上海肩负的为国家财政做贡献的担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却很少，这让上海的领导人感到不满，他们一直在要求北京改变政策。

“从集中人力抓紧办事这方面说，资本主义赶不上社会主义。”——邓小平

关于统治和自由的问题，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持。领导人要想办法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决定一旦做出，就应当服从集体决定。

邓小平审阅并批准了江泽民将在十四大上作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他南行时表明观点：加快改革开放。

中共十四大

中共十四大像以往一样，对有关当前和未来政策的文件做了认真讨论，但它首先是对邓小平及其成功政策的公开颂扬——实际上，是为他的退休召开的欢送会。

从那一刻起，江泽民不再需要回头看邓小平是否同意；权杖已传到他的手里，邓小平等人现在把他称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邓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

记住邓小平

邓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第二十三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

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

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发挥一定作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派出一个大使，驻于埃及。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但邓小平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所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做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权力。

最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可以陪同上级参加各种上面的会议和党内的非正式聚会，可以进京学习中央党校的课程；认为能够担任省市级领导职务的人，则去各自地区的党校学习。

进入党校学习的人不但能了解同届与上下届的同学，而且能结识来到党校的上级干部，后者会借助于党校干部的评价，对学员未来的任职进行推荐。

邓小平重视精英治国的做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按考试成绩选拔官员的国家。

毛泽东认为“红”比“专”更重要，他喜欢工人农民甚于受过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大胆取消了“阶级出身好”这条选拔干部的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的办法。

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

干部选拔制度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毛泽东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可是他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却进一步巩固了封闭的“封建”社会。

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在1980年代的中国，当市场爆炸式地增长时，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也不可能马上训练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官员。从某些方面看，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类似于19世纪的美国西部，当时那里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

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的区域，政府在几年内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将其改造为公园。在地铁建设的高峰期，像广州和北京这类大城市能够在几年内以平均一年一条线路的速度建设地铁。

(邓、江卸任后实际上在垂帘听政)

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为自由划定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邓小平相信，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